

**关于右派分子图謀資產階級社会学
復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
活动的一些材料**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

1957年8月

目 錄

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	費孝通（1）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費孝通（4）
在“爭鳴”月刊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費孝通（5）
社會學的對象和內容決定於它的任務·····	費孝通（6）
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麼·····	費孝通（9）
重訪江村（另印）·····	費孝通
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	吳景超（11）
提高民主黨派建議的質量·····	吳景超（12）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吳景超（13）
一些可以研究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吳景超（14）
李景漢企圖篡改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研究室政治方向的陰謀·····	（15）
（人民大學付校長鄒魯風同志的發言摘錄）	
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另印）·····	李景漢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李景漢（19）
開展對家庭、婦女等現實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	李景漢（20）
社會學與人口問題研究·····	文匯報駐京記者劉光華（22）
——與陳達教授一席談	
請問高教部：為何取消勞動專業？·····	陳 達等（24）
趙文璧在民盟支部擴大整風座談會上的交代·····	（26）
右派分子趙文璧的“無產階級社會學大綱”·····	（27）
社會學政治學需要發展（新聞報導）·····	文匯報（30）
要求在大學恢復政治學課程（新聞報導）·····	光明日報（31）
（一些政法教授在上海民盟座談會上）	
也為社會學說幾句話（節錄）·····	言心哲（32）
“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34）

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

費 孝 通

关于社会学，我原本不想發表什么意見的。這個問題我很久已經不再去想它了。最近吳景超先生在新建設上把社会学的地位問題提了出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匯報記者要我說几句話。

我和社會學的關係

先得交待一下，我个人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讀書和教書的时候，的确一直和社会学有点关系的，但实在說来我和一批朋友却也是一直在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貨，叫它什么学也說不清楚。这私貨就是少数民族、农村、市鎮、工厂的社会調查。这套东西在英美的正牌的社会学家看来是行外的；一定要归个行，倒近于英美的所謂社会人类学，我們現在称作民族学的那一些東西。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牌子掛不大出来，所以一直混在社会学系里。要找个說法，我們就說，我們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調查研究中国現代社会的社会学。我們这些东西混在社会学里並不是为当时所有社会学界所同意的，至少並不是正統。所以我覺得一直有些搞私貨的味儿，說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

由于我和社会学有着这么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我对于一般所謂社会学不免是有点偏見的。要我来發表意見自不免缺乏代表性。这是我不想發表意見的原因。如果只从我个人出發来談，我覺得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对我似乎並沒有多大关系。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取消之前就調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我有机会去实地調查研究少数民族 社会 生活，一方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改造自己的立場、观点、方法，一方面还是可以利用我过去的訓練，繼續我的學術工作，我並沒有“改行”的感觉，只是覺得現在學習和研究的条件好多了。在这些工作上我一直是積極的。因为这个緣故，我也不再去想社会学有沒有地位的問題了。在我，這個問題是解決了的。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我还覺得卸去了一個包袱。

社會學問題的提法

但是，这时候把社会学的地位問題提出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覺得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我倒並不是因为苏聯派代表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新时代杂志上又提出了中国沒有代表出席的話，才覺得我們該考虑一下在各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做得对，現在应当不应当恢复的問題。我是不很贊成这种態度的。我並不想再去討論几年前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是正确的。我也並不想在社会学这个名詞上来做文章。我覺得應當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上来提出這個問題。

問題是这样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其中主要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要求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产生

相適應的改變。這些變化都存在着客觀的規律，我們如果能掌握着這些客觀規律，那末改造起來就順利些；如果摸不清這些規律，我們就會吃虧。這裡就有學問，也就有科學，研究生產關係的經濟學，那是有了基礎的。其他許多關係的研究我看還都沒有很好的建立或發展起來。這話說來，就牽連得多了。我也沒有考慮成熟，如果作為一般討論，我不妨說說我的意見。比如我最近調查了一些黨和非黨的共事合作關係，我意識到這裡有一門很複雜的學問，那就是怎樣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里的人民內部的政治關係。這問題可以包括更多的內容，好像人民代表大會制的運用、民主黨派的互相監督等等，有關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人類的新問題，是在階級消滅後人和人政治關係問題。把這些關係作為客觀存在的事物來研究它的變化和運動的規律不是一門新的學問嗎？如果要掛個牌子，我想也可以說是政治學。

我這兩年來又調查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其中有一方面是屬於知識分子思想的變化，那是新的政治關係在人們思想上的反映和變化，如果專門加以研究，總結一些經驗出來，我想又是政治學中的一個極有意義的部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問題。這些問題現在是處理得不免太簡單化了些，而且的確出了一些問題的。其實，這又是一門學問，我想就是行政學或管理學。

上面所說的那些問題，現在儘管沒有進入学府來進行研究，在黨派和政府機關里是有調查研究的。但是還有些人和人關係的研究卻落了空。比如兩性關係罷。這是存在於人和人之間一種很重要的關係，但是認真地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的重要部門來加以調查研究卻就很少了。現在不論是那個地方，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夫婦問題、養老問題、兒童問題等都有一大堆，而且大家總是覺得最頭痛，甚至不知道怎樣處理才妥當的。社會進步得這樣快，這些方面都需要建立起和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關係，而新舊交替之際，出現些混亂現象是難免的。不採取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的進行調查研究，這些問題得不到妥當的解決，使得許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動，甚至違法亂紀，對社會主義建設是很不利的。

再舉個例子：最近很多人注意了人口問題。這個問題不論怎樣說法總是存在的。過去却因為批判了馬爾薩斯人口論，大家都不敢再提這個問題了，好像誰一提這個問題就該批判似的。實在來說，好好地研究這個問題正可以否定馬爾薩斯的理論，而建立起我們的正確觀點來。大家不敢談，並沒有取消這問題；以致一松口，就出現了“吃蝌蚪”的不科學的宣傳。我並不怪宣傳吃蝌蚪的人，更不怪吃蝌蚪的人，而要怪阻礙研究人口問題的帽子。

在這裡我不想羅列出一大堆問題來，只想指出這類問題是會跟着社會發展不斷出現的，並不會太平無事的。對於這些問題用科學方法來調查研究比閉了眼睛說沒有問題對我們有利。如果我這樣說法是對的，自然要問，誰來研究，由黨派和政府的幹部拿出一部分力量來研究好呢，還是搞一批人出來專門做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專業來搞應當好些。搞得出一套學問來嗎？我認為是可以的。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物，它的變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來，不就是學問嗎？至於這些科學稱什麼名稱，那

倒無宏旨。如果大家覺得社會學三個字不討厭，用這三個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個順眼些的名字來，當然也好。

也許現在還有人懷疑這些是否夠得上稱什麼學，我想也不必在這個字上引起爭執。如果大家承認這些問題有必要系統地調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調查，稱作“社會調查”也可以。我想反對“社會調查”的人理由是會不多的。

從事社會調查的人員

有沒有會搞社會調查的人呢？我認為是有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以前在各大學里教社會學和學社會學的人。他們過去搞過這套調查工作，立場、觀點、方法固然有不正確的地方，但是這些是可以通過學習來改造的。他們原來學會的那些訪問、觀察、記錄、統計、分析等技術還是有用的，而且他們多少也了解過舊社會里的社會情況以及當時的問題，調查起現在新舊交替的情況時，還有很多知識大有用處。如果要搞這些工作，我願意保舉這一批人員。

取消了社會學系之後，這批人那里去了呢？現在怎樣了呢？我所知道的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很得其所哉的，在新崗位上搞得蠻起勁，要他們回老行是做不到的。我就屬於這一類。第二類是那些有了新的崗位工作的，也能勝任，但是心里還不忘舊好，有機會再繼續搞老行是樂意的。第三類是一直沒有安定的，我就知道有一位老教授，院系調整後，一連改了三次課程，改得他三日京兆，無所適從。我知道有些沒有開課，學了俄文在搞翻譯工作的。我也知道還有在政府參事室里，除學習之外，沒有什麼事做的。他們如果能回到老行來，那真可以幫助解決些知識分子的安排、使用問題，這些人的精力這樣是可以發揮的。第三類的人並不是個別的。總的看來，這項工作不是沒人。

有事也有人，但還缺一條，就是要個組織，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工作。如果承認這些也是科學研究，那就應該安在科學院里，能成立個社會學研究所那是最好了。如果覺得社會學這個名稱不體面，不妨稱社會調查所。說起來，社會調查所是有個歷史的。現在北京文津街科學院辦公室的建築原來有一半就屬於過去的社會調查所的。那個社會調查所的所長陶孟和先生，現在就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其中不無瓜葛可緣。話暫且說到这里，聲明一下，我原來已不再想這個問題了。這段話是被人勾出來的，考慮得是不夠成熟的。

2月12日（文匯報）

費孝通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

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上午）

很多人担心社会科学沒有前途。毛主席講話後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有矛盾就要处理，要处理就得考察分析研究这些矛盾，这就需要有知識，这就是社会科学。所以它还会有广闊的前途。如当前妇女問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什么年齡結婚好，應該有几个孩子算夠了，就需要好好研究，今後社会科学大有可为。

是否有人在研究？有些有，有些沒有，有的还未进科学之門。大的問題，例如民主党派現在就沒有一本書，政法学院中也沒有那一課講民主党派；小的問題如結婚問題，中国人平均在什么年齡結婚等等，就不知道。总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还是薄弱的。原因是什么？

1、它与自然科学不同，同階級鬥爭关系密切，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它是統治工具的一部分，因之解放後不能把它直接拿过来为我們服务，而要加以改造。

2、有革命經驗的同志太忙，無時間写文章。

3、社会科学不比技術，不能請外国人代替我們搞，只能自己搞，但解放才几年，時間短，因此就虛一点。

有沒有力量？有，有过去搞社会科学的人，有新的力量，过去搞社会科学的人現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改造好了的，如历史学中；一种是老店重开，但縮小了門面的，如經济学；一种是关門了事，各奔前程，如社会学。第一种好，第二种太 好，第三种又好，又不好，改好了的是少数，改不好的是多数。

今後怎么办？

总的說要修橋補路。即新的与旧的要連起来，还要多开几条路出来。具体說：

1、对社会科学的眼光应当改变；至少应当把它当内部矛盾处理；

2、要一行一業加以安排；

3、大胆使用，通过工作来改造人們的思想；

4、要多找些行道出来，如人民内部矛盾，大大小小开出来，讓大家研究；

5、量才使用，有的不能研究的就搞文献、档案、年表等等；

6、把各种学会組織起来，作为联系的組織；

7、培养新生力量。

費孝通在“爭鳴”月刊召開的座談會 上的發言（摘要）

关于社会科学的問題

我想現在似乎還談不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問題。要發展社会科学還有許多基本的認識問題要澄清一下。問題是不少的。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是怎樣發揮許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問題。我考慮這個問題覺得關鍵還在我們怎樣對待旧的 社会科学。這個態度問題不解決，那些過去搞過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還是發揮不出來的。

問題是出現在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里沒有社会科学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会科学”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因此，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会科学要從頭創造，沒有什麼遺產可以繼承。對於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這些全是敵人，是毒素。如果採取這種看法，舊社会科学是對抗的，接不上頭，也沒有接上頭的必要了。我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是有錯誤、有缺點的，因為它受到階級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資產階級要用它來解決它社會里的問題，雖則它不能解決這種社會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在他所解決的問題的範圍來說，他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虛假的，都是些和客觀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錯覺。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實，這一部分的知識還是應當有用的。不但如此，資產階級社會里的階級鬥爭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複雜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是不是只代表統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沒有代表反統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那麼我們為什麼全部否定資產階級社會里的社会科学呢？有什麼根據可以說沒有任何遺產可以接受呢？

其次是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問題。如果認為旧的社会科学只有毒素，那麼這些人首先是消毒的問題。消完了毒，從頭再來，自然不及沒有受過毒的人學起來更快些了。他們是象背了包袱賽跑，愈跑愈慢。如果認為旧的社会科学是可以批判接受的，那麼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個改造的問題。他們經過改造，還是大有可用的；而且經過改造，他們對社會認識得更深刻，比了沒有經過這番鬥爭的人經驗多，閱歷深，見識廣。現在，我覺得第一種看法還是較佔上風。因此，很多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脫離了科學隊伍，或是在隊伍里發揮不了作用。這種情況我認為是不正常的，對於發揮潛力是不利的。

社会科学的隊伍里，新舊不接，少數先鋒隊背後拖着一大批發揮不了作用的“旧人物”，這個隊伍的力量自然是不会太壯大的了。力量發揮不出來，成績也就不会顯著，擺着許多需要研究的問題動不了手，社会科学的地位也談不到提高了。如果社会科学被人輕視，我想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隊伍里自己沒有團結，沒有發揮力量的結果，怪不得別人。

我認為發展社会科学還得先解決這個對旧的社会科学的態度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談得到真正對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進行團結改造工作。這是發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碼的一步

社會學的對象和內容決定于它的任務

費 孝 通

关于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的问题我还没有很成熟的意見，只能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参考。

我觉得一門学科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决定于它的任务，一門学科的任务是从人們的实际生活里提出来的。在規定某一个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时，还需要明确和其他学科的分工，和它的特独园地。

从这个看法出发来考虑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必须看一看我們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那些問題？那些还没有其他学科进行研究？这些問題属于什么性質？和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没有区别？

最近幾次討論中，已經提出了許多应当进行而現在沒有研究的当前社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問題，家庭問題，城市服务問題，以及犯罪問題等等。因此可以肯定社会学是有对象可以研究的。

但是我們还没有把所有的社会問題都發掘出来，作一个系統的归类，而且对于每个問題的内容也沒有系統的摸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全面的規定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还没有条件。我們是不是必須先把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弄清楚了，再动手工作呢？我想是不必要的，不妨採取一个問題一个問題逐步展开的方法，等一个时候再来系統化。

我同意很多先生所說的，过去社会学並沒有一个共同接受的定义，也沒有一个共同的所謂社会学理論系統。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是資本主义社会里所發生的各种社会問題，而絕大部分研究者是立場是站在资产階級这一面，想通过他們的研究来緩和資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这是主要的一面，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当然也存在革命的社会学，那就是“馬列主义社会学”，但是由于“社会学”这个名詞已經被资产階級所佔有，排斥了革命的社会学，革命的社会学也有不願用这个名詞，以免混淆立場。所以，一談到社会学，主要是指资产階級社会学。

资产階級社会学是反动的，因为它服务于剝削階級，反对革命。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样的学科是不能容許它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認为在我們解放後取消了这門学科的講壇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也存在社会問題呢？那是应当肯定的，既然存在就应当有个学科去研究它們。那就是說，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我們現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問題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于資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問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剝削階級是消灭了，生产关系是改变了，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生产关系和上層建築之間出現了各种矛盾，形成了种种社会問題。在一定时期里还存在着过去階級社会余下来的本質上还是階級矛盾的問題，而且也存在着階級内部的种种矛盾。

盾，情况是很复杂的。

从表面上看，我們現在还存在着的人口問題，家庭問題等等是在旧社会中已經有过的問題，但是本質是有了变化。如果我們不掌握这个变化，从而認為旧社会学的一套可以用来研究这些新問題，我們是会犯錯誤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覺得“恢复社会学”的提法是可以考虑的。也因此，我們过早的成立社会学系也是不相宜的，我們还需要一个時間来摸索新的社会学的内容和做法。

另一方面，我們能不能說过去並沒有我們这里所說的新社会学呢？我想不能这样說。我同意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新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学可以說已經有了基础。那么是不是不必再成立一門以“社会学”为名的学科呢？那是可以进一步討論的。我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社会学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有了基础並不等于就有了房子。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里不可能包括許多社会問題的具体分析，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論也決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問題。因此，我看，新社会学的内容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基础上，和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問題的分析研究，从而累积对这方面的知識把它系統化，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

再一方面，我們是不是要和旧社会学割断关系呢？我認為要割断的是貫串在旧社会学里的反动立場和反动理論系統。在立場上不分清是決不可以的。但是旧社会学里除了这些必須割断关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們可以也必須繼承下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资产階級社会里所產生的問題和事实，可以作为我們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的資料。

第二，我們当前的社会实际一方面还有着旧社会的殘余，一方面又有資本主义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是我們产生社会問題的一部分根源。如果我們不了解这些，也就不容易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

第三，旧社会学也积累了一些方法和技術，这些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技術，譬如人口統計，城市的区位圖表等，都是整理材料时必要的过程。当然，在新社会里，有許多社会条件已經改变，因此原有的方法和技術也必須加以一定的改变，而且还应当創造許多新的方法和技術来分析研究新的資料。

第四，社会生活中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在階級社会里就是各階級所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好像气候等自然条件，語言等人們交际工具等，对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虽則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过去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識，还是有用的知識。

资产階級社会学里那些东西必須批判，那些东西可以繼承还需要深入討論。这种討論对于我們这些高过资产階級社会学的人更是重要。

我具体建議，一方面我們可以从若干当前社会問題的具体研究入手，开始从实践里来建立新的社会学，另一方面我們应当學習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馬列主义理論工具，对资产階級社会学进行批判。要有效的进行批判工作，我想首先要把资产階級社会学的若干主要流派，系統的加以介紹。介紹时要力求符合原意，然後，严肃的，实事求是地，从立場、观点、方法各方面进行分析，明确他們錯誤在什么地方。同时，我們进行研究

工作中，也会由于我們自己受着資產階級社会学很多的影响，出現錯誤和缺点，因此，也必須不断的對我們自己的工作進行批評。我們這些旧社会学里成長的人，對自己還需要一個改造的過程，我們必須在不斷自我改造中去建立新的社会学。

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分工，也是一个今後還要深入討論的問題。比如，有人提出社会学和民族学有什麼區別？我們是否可以分別成立人口学和家庭学等学科而不必籠統称为社会学？這些問題都存在的，而且需要明确的。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是不是可以留着今後再繼續討論？當然，我們並不一定要討論出了結果來了以後再進行工作。我認為不妨先在一些社會問題上分別進行工作，在工作中摸索出一些門路出來之後，再來明确這些問題。

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麼

費孝通

最近劳动干部学校召开过一个关于人口問題研究的座談会，在会上陈达先生提出了一个人口問題研究的提綱，进行了討論。我在这个会上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作为一得之見，在这里提出来，供关心這項工作的朋友們参考：

我想人口問題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或是四个步驟：

第一是人口統計，就是調查清楚人口数量。怎样調查得清楚人口数量呢？最主要的当然是全国普查，比如1953年，我国舉行过一次全国普查，这是基本方法。但是只靠这样的普查还不够，因为全国普查不是輕而易舉的，必須隔一定年份才能舉行一次，而且普查項目不能多，比如1953年我們的普查只查清了人数，男女性别，年齡和民族。人口数量的分析还要仔細些，比如职业等等，在現在的条件下，普查的項目不宜太多，因此，要更精細了解人口数量，还要採用另外的方法。对全国普查中出現的特殊問題也还得深入研究。比如少数民族普查問題就不簡單。1953年的普查中，关于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只能採取估計的办法，而且在族別問題上当时也只能採取自报自填的原則。不但貫徹时有困难，还發生包办代填的情形，而且所自报的民族是不是能作为少数民族来看，也有很多是成問題的，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除了全国普查之外，可以採取典型單位的抽样調查。只要我們抽样抽得好，很可以从此看到一般的情况。把調查範圍縮小了，項目就可以增加些。即便在沒有条件对某些人口現象作全国性的普查之前，我們也可以从这些典型單位作基础，得出比較正确的全面估計。

因此，人口数量的調查在方法上有許多問題是可以經常進行研究和試驗的。

第二是人口变动，包括出生、死亡、遷移、婚姻等等。当然两次普查的差額就可以看出人口变动，但是在两次普查之間的一段時間里發生了些怎么样的具体变动，却不容易从兩個比較数字上看得清楚。因此，应当跟着人口变动隨時記錄下来，那就是人事登記。在我們中国人事登記的制度还没有确立，有些大城市是有一些登記的，登記的正确性怎样，也还没有科学的檢查，比如死亡登記中有关死亡原因就有很多地方由于沒有診斷的条件是不很科学的。为了掌握人口变动現象，就应当有几个地方先建立起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吸取經驗，並且用这些地方的材料作为估計全国人口变动的根据。这又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最近提倡晚婚，但是有誰說得出我国平均的婚姻年齡？在这些很重大的有关很多人生活的問題上，我們却常常只能用常識办事，或是临时進行些突击調查，那都是不很好的。

第三是比較分析。人口的数量，加以比較分析，就可以看得出很多問題。比如比較各地方的数字，就可以看得出人口分布上存在的問題。再和資源的分布相对照，可以給我們指导人口流动的方向。比較历年婚姻的数字，就可以計算出今後人口增长的速率。比較解放前和解放後的数字，或是比較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的数字，可以

說明我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些比較分析可以提供制定有关各方面政策的基本資料。比如教育上許多政策方針就必須預先知道今後入学儿童的数量。知道了入学儿童在今後十年內会增加多少，現在就得注意培养多少教师了。沒有这种科学的預見，一定会临事倉惶，無法應付。在国民經济計劃中，人口数字应当是最基本的資料。

第四是人口政策。一方面我們應當依据人口的变动来决定我們国家的許多基本措施；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依据我們經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可能發展的速率来規劃我們人口的增长。过去不少人把人口增长作为出于人力範圍之外的自然現象，那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認為多一人必然比少一人好，並且說因为一个人的劳动必然能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消費的数量，有所剩余，因此人口不必加以控制，那也是不对的。說起道理来很簡單，自从人類走出原始社会，就有了剩余产品。就拿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論，如果所剩余的为数很少，不能积累起来發展重工业，那就很难想像这个社会能进入社会主义了。我們現在要發展的不是其他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應當有这样簡單的想法了，應當算算賬，一个人要多少生产資料，这些生产資料值多少錢，怎样去积累这笔資金。因此，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根据各种条件可以算出一个人口的适中数。人口增長率超过了这个适中数是会迟緩社会發展速率的。因此，必須有个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並不簡單。除了社会經济的發展速率外，还要看到人口分布不平衡、各阶层生長率不平衡等等因素，人口怎样發展才好，必須細致分析。

政策怎样貫徹又是個問題。人口增長固然是人們可以左右的，但畢竟是生理現象，而且有許多密切相聯系的思想觀念，並不能象工厂里出品一樣，要多少出多少，不要了可以停止生产。去年宣傳了“吃蝌蚪”，引起的社会效果並不是好的，而現在推广避孕藥物是否切实可行，行起来又怎樣，其实都是問題。一陣風的高法，無論如何是不妥当的。这又說明必須有科学的調查研究紧紧跟着，使我們的政策能貫徹得好些。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加以足夠的注意是不成的。

最後，我覺得劳动干部学校召集这次座談会，从科学出發来討論怎样开展人口問題的研究，以我所知道的來說，解放以後还是第一次。这應當是个良好的开始，而且應當感谢这次會議的主人。但是，這樣的規模顯然和国家的需要是不相称的。这个和国家事業密切相关的大事，决不是少数几个学者，在一兩間房里，四处乞討資料，閉門研究可以胜任的。因此，我很希望有关部門能及早認真的考慮一下，怎样把这种科学研究机关建立起來，並且創造必須的条件，把這項工作好好的推动一下。

（“新建設”1957年第4期）

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

吳景超

1956年10月19日的“真理報”上，登載了一篇蘇聯科學院通信院士費多塞也夫所寫的一篇文章，報導關於國際社會學會第三次會議的情況。這次會議，有57個國家的500個代表參加，其中也包括蘇聯及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文章中除敘述了在會議中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鬥爭以外，在文章的末尾，特別指出一點，就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學者，發表了大量的關於勞動、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與鄉村等問題的文獻，但是這些材料，在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社會科學工作者沒有對於它們進行分析與批判。這一缺點，應當很快地加以矯正。

看過了這篇文章以後，又得到一次機會與波蘭科學院的奧爾格爾德·魏得志談話，他提到了參加國際社會學會會議的情形，並送給我一篇華沙大學的一位同志在這次會議所宣讀的論文。當時參加談話的，還有過去搞社會學的潘光旦、嚴景耀及雷潔瓊幾位同志。

這一切，使我想到中國的社會學往何處去的問題。

在解放以前，中國許多大學中都設立了社會學系。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分都改業了。當然這不等於說，過去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現在沒有人研究了。不是這樣的。社會學的某些部分，如勞動問題、民族問題，在我們的高等學校中，現在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是也有些部分，現在還未得到適當的安排。我在這篇短文中，只想對於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個初步的意見。

社會學原理及近代社會學思潮這些課程，是舊社會學的核心部分。它是歷史唯物論的對立物。資產階級的學者，以社會學的理論來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抗。因此，整個地說來，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其立場、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是錯誤的。但是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在我們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在這一門課程中，可以利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學進行系統的批判，同時也盡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來豐富歷史唯物論。我國的歷史唯物論者，在與資產階級社會學進行思想鬥爭的過程中，也可以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

舊社會學還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論及統計，社會調查（都市社會學與鄉村社會學都可併入社會調查之內），婚姻，家庭，婦女，兒童等問題，社會病態學中的犯罪學部分，都可酌量併入其他學院有關各系之內。開設這些課程，當然不能採用舊的課本，講授時也不能採取舊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但是以歷史唯物論的知識為基礎，來研究這些問題，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也還是有用的。

（“新建設”1957年1月号）

提高民主黨派建議的質量

吳景超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提出之後，民主黨派的責任更加重大了。民主黨派必須對於國家大事，不管是國內的或國際的，向我們的領導黨提出建議，作為領導黨決定政策的參考，這是一件繁重的但是光榮的工作。

社會主義的民主，有一個特點，就是黨和政府制定一種政策或者採取一種措施的時候，總是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人民的利益是什麼。黨和政府對於某一問題，應當採取什麼辦法，才最符合於人民的利益，必須總結羣眾的意見與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解答。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民主黨派是參與國家大事的。領導黨對於每一重要問題的決定，總是要事先與各民主黨派充分洽商的。民主黨派的意見，歷來是受到領導黨重視的。但是過去民主黨派在向黨和政府提供意見時，還缺乏充分的調查與研究，對於集中民主黨派內部羣眾智慧的工作，也做得不夠，這就使民主黨派所提出的建議，還不能達到適當的質量水準。

為了矯正這一缺點，我們建議在各民主黨派里面成立政策研究委員會，對於國家大事進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這一類的政策研究委員會，可以斟酌各民主黨派成員的性質，設立一個以至幾個。譬如以中國民主同盟來說，對於國際問題，經濟建設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文教政策等問題，都可以設立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以盟員中對於這些問題有興趣有研究的人充任。他們可以有計劃地對於一些問題進行經常性的研究，也可以在某一時間集中精力研究領導黨所交下的問題。研究的結果，可以通過組織的適當途徑，向領導黨及政府反映。我想，經過一些專家研究後再提出來的意見，質量是可以大大提高的。這樣做，可以發揮民主黨派成員的內在力量，可以吸收民主黨派廣大成員，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對於迅速完成我國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有很大貢獻的。

這一工作如要做好，除了各民主黨派的組織方面，必須進行適當的改革外，我們還希望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工作，加強領導。有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就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內外發生的重大問題，隨時供給各民主黨派以足夠的資料。沒有對於反映客觀存在的大量資料進行細密的分析，就隨便提意見，提建議，是會經常脫離實際的。一個孤陋寡聞的人，信口開河縱談天下國家大事，是經常會鬧笑話的。為要避免這種缺點，各民主黨除了自己要加強調查研究的工作以外，希望中國共產黨對於這方面多加協助。

（“政協會刊”，1957年2期）

在國家統計局召開的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吳景超

茲將個人對於統計局工作，提出幾點意見，作為參考。

(1) 國家統計局過去所搜集的資料，多在保密的招牌下凍結起來，以致人民對於這些材料，無法利用，實為一大損失。統計局的內部資料，幾乎全部可以公開，而不會為國家招來損失。(個人意見，除國防及外交資料外，其他都可公開)現在對於公開這些資料的障礙，是思想上的障礙。即若干領導，思想中還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殘余。(我不說是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我們所說的許多保密資料，都是公開的)這就造成在人民內部，有一部分人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們得到這樣或那樣的資料，而另一部分人則什麼資料也看不到。我建議，首先把統計局內部人手一冊的那本統計手冊，整理付印，然後把內容逐漸加以豐富，使全國人民，都可享受統計的果實。

(2) 國家所公布的統計，應逐漸取消相對數字，增加絕對數字。如“統計工作”第九期所公布的第一季度國民經濟簡況，都是相對數字，可以說是價值很少，或者可以說全無價值。譬如說，電力完成計劃的99.4%，對於老百姓來說，這個數字有何意義？99.9%的老百姓，看不懂這個數字，只有那些少數主管電力生產的人，才懂得這個數字，但是他們根本不需要從統計局得到這點知識。假如這個數字用絕對數發表，如發電若干度，意義就大得多，很多老百姓也都看得懂。利用這個絕對數，老百姓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算出不同的相對數字。因此，我建議，以後統計局發表的數字，最好是原始的絕對數字，不必加工出一個相對數字來，使老百姓看了莫明其妙。

(3) 國家統計局每年發表的公報，時間太遲，應爭取上一年的總結數字，於下一年一月底與社會見面。至遲不要在二月底以後。

(4) 國家統計局與高等學校的聯繫，1956年起已有改進，但還可以合作得更密切些。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一些經常性的或暫時性的研究小組，在小組中，既有統計局的專家，也有各校的教學人員，有些學術性的問題，可以先在這些小組中加以討論，提出具體辦法，作為行政上的參考。這樣，對於教學與統計行政，都有好處。譬如統計方法，指標體系等等，都可設立經常性的研究小組。

(5) 地方上的統計人員，應加充實，否則地方上報的統計，質量難於提高。以後分配大學生，可以多考慮一些地方上的要求（特別是省市一級）。更好的辦法，是把國家統計局的專家，下放一些，同時把分配來的大學生，在業務實踐中培養若干年後，再行分發到各省市，使其擔任一部分調查研究工作。這樣，就可把地方上的統計質量，逐漸提高起來。

（“統計工作通訊”，1957年第12期）

一些可以研究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吳景超

过去的社会学原理所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的立場、观点与方法，有所不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原理可以不必要了。可以开一門近代社会学思想史，来代替社会学原理。在这一門功課里，介紹並批判自孔德以来，歐美各个社会学派研究的成績及其錯誤之点。除此以外，还有若干社会現象及問題，可以在社会学系或社会学專業中講授。

第一，人口問題，在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中只講一小时，这是很不够的，应当拿出来加以充实。

其次，婚姻、家庭問題，虽然恩格斯对这一門學問很重視，而且还写了一本专著，但是現在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書中却講得很少。社会学可以来研究。現在法院中离婚案層出不窮，兒童問題也很严重，需要进行研究。

第三，城乡关系，这里包括着工人、农民、知識分子之間的关系，上層建筑与基础之間的关系。这就是过去的“都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所研究的，可以和社会調查結合起来。过去的社会調查，搜集材料不少，但是分析不够，因而不能發現事物变化的規律。

第四，社会問題中，如民族問題，已有專門机构进行研究，但除此以外，还有犯罪問題，劳动問題，住宅問題，生活費用及生活程度問題等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还有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知識社会学等，过去中国也沒有搞过，我看将来也可以搞搞。

李景漢企圖篡改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 研究室政治方向的陰謀

——鄒魯風副校長的發言節錄（1957年7月20日）

在發給大家的反右派鬥爭的小冊里第71頁，有一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關於恢復資產階級反動的社会學，成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和陰謀篡奪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方案。

對於我來說，這同樣是一個相識已久的東西。自今年春天以來，我也不只一次地從吳景超、李景漢那里“領教”過和無數次的鬥爭過了。

這個方案，像上面的“意見”一樣是一個右派分子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篡奪黨的領導的罪惡活動的組成部分。

對於這個反動綱領，我不想作詳細分析，主要的想着重介紹一下有關我們學校的部分。因為這是我親身鬥爭過，比大家更熟悉些。說明一下，對大家了解右派分子的陰謀的內幕，和認識右派分子吳景超、李景漢等的真正丑惡面目會有幫助。

在6月9日右派分子吳景超、李景漢、費孝通等人在陳達教授家里開了一個會，叫作：“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在這個會上他們討論通過了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和篡奪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反動方案。這個反動方案首先是關於成立“學會”和規定“任務”。

（一）關於本會名稱和任務：

“名稱：社會學工作委員會，隸屬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推陳達擔任主任委員。”

這裡我要向吳景超先生請教一個問題，即你們這個“社會學工作委員會”既然“隸屬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你們事先征求過科學院的同意，經過科學院的批准嗎？我懷疑你們是在開黑店，干着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走私勾當！你們的“委員會”，既然隸屬科學院，為什麼又私自選舉陳達為主任呢？你們有什麼權力替科學院作決定？你們簡直是猖獗到極點——目無政府，目無法紀，儼然成了科學院的“太上皇”！

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向科學院調查過。吳景超先生最好請你解答一下。

下面我想着重談一下吳景超、李景漢等右派分子篡奪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陰謀。上面有的同志在發言里說：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的成立是由于民盟的建議。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我這麼說，並沒有絲毫責難剛才發言的同志的意思，因為我知道他不了解全部情況。我校醞釀成立調查室，遠在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了，民盟的建議遠在這以後了。

事情的開頭是由于高教部楊秀峯部長的議建。在去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和胡校長到高教部開會，楊秀峯部長向我們提出了這個建議，以後我去開會他又一次提到這個問題。他說：人大都是社會科學的專業，為了使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更好的結合實際，應該多作社會調查，同時，他要我們考慮建立一個專門的社會調查的機構。胡校長和我認為楊部長的意見是很正確的。不久就在黨委會提出討論，並決定成立調查研究室。接着在校行